

并行路径

阿提世·雷克斯·戈什采访横跨学术界和政界的克莉丝汀·福布斯

为儿童进行驱虫治疗似乎不可能引起经济学家克莉丝汀·福布斯 (Kristin Forbes) 的兴趣，因为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学术工作或政策制定工作。但是，作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她一直都愿意走一走不可能的道路。

福布斯目前也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外来成员，专注于研究金融传染（即经济问题是如何在国与国之间扩散的）、跨境资本流动、资本控制、一国经济政策如何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等国际问题。

但是，当发现同事提供的证据表明让发展中国家儿童待在学校里是帮助这些儿童摆脱寄生虫困扰的最合算方法之一的时候，她就帮助成立了一家旨在为儿童进行驱虫治疗的慈善组织。

即便如此，在麻省理工学院、世界银行、英格兰银行、美国财政部等机构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仍然占用了福布斯的大部分时间。

然而，她走上这条道路也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运气或巧合不止一次地起了关键作用。福布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长大，少年时对户外运动产生浓厚兴趣，曾就读于公立高中。尽管该高中的学生成绩良好，班上有一半人可以上大学，但大部分同学却只把目光放在了新罕布什尔大学。所以，当福布斯表示自己想上阿默斯特学院或威廉姆斯学院等更有声望的大学时，她的辅导员感到困惑不解。然而，福布斯最终进了威廉姆斯学院，这也是她“铺设自己的道路”的早期例证。

很多的选择

在威廉姆斯学院，福布斯面临着很多选择，最终她挑选了天体物理学、宗教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课程。她把自己能对经济学专业产生兴趣归功于自己的基础经济学教授莫顿（“马蒂”）·夏皮罗 (Morton Schapiro)，后来成为威廉姆斯学院院长，主要因为他能用基本经济概念来解释日常生活。比如，他曾以消费太多啤酒为例（而不是与大学校园生活无关的例子）来说明边际效用递减以及最终变成负效用的原理。尽管如此，她仍徘徊在经济学、历史学、



政治学之间（享受不同专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最终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并以最高荣誉毕业。

毕业后，福布斯认真思考了下一步的发展，在像父亲一样当律师还是当医生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却进了摩根士丹利的投资银行部门。尽管已经了解了市场（这些知识在她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时派上了用场），但福布斯很快就意识到投资银行并不适合她。随后，幸运的她迎来了一次转机。威廉姆斯学院的教授理查德·萨博 (Richard Sabot) 将她引荐给了南希·伯索尔 (Nancy Birdsall)，南希当时正完成世界银行 1993 年的东亚国家如何取得经济成功的研究项目，也在寻找能帮助她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员。

因此，福布斯就去世界银行工作了一年，在那里初尝政策导向研究的滋味。与伯索尔和萨博共事激发福布斯产生了像他们一样成为职业经济学家的想法，也让她意识到要想成为职业经济学家，影响世界的运转方式，自己需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福布斯的视角与大多数研究生不同，因为后者一般倾向于对模型和理论本身着迷，而不是运用模型和理论来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而在研究收入不平等对增长的影响时，正是这种视角为她赢得了声誉。她的研究论文在2000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是她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完成豪斯曼(Jerry A. Hausman)教授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作业的一部分。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收入不平等还不是热点。但伯索尔和萨博已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增长不利，而且该发现(至少在政策圈内)也已引起一定的反响。而福布斯运用了较新的数据和更先进的(近期开发出的)技术重新研究了这一问题，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虽然跨国比较都会指出收入不平等对增长不利，但通过考察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况，她发现增长与不平等的加剧是正相关的。

这一经历除了能让自己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以外，也告诉福布斯在制定政策时进行认真分析的重要性。福布斯也许是以对金融传染的研究而著称，因为这是她一生工作的标志性主题。当“传染”似乎在盛行时，她正在撰写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余波的相关文章。

她的论文剖析了传染(一个迄今为止使用非常随意的概念)的含义，也因此帮助阐明了传染的发生时间和原因。正如罗伯特·里戈邦(Roberto Rigobon, 其合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同事)曾经的评论所言，“克莉丝汀是金融传染实证分析领域的领先者之一，她的论文对任何有兴趣衡量金融传染的重要性、存在和程度的人来说都是杰作。”美国央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高级顾问斯泰恩·克莱森斯(Stijn Claessens)也曾与福布斯一起对金融传染问题进行研究。他说：“她将学术标准定得非常高，时刻牢记研究的政策相关性，通过指出我们理解上的巨大差距来激励他人，并以让人容易理解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洞见。”

在另一篇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福布斯关注施加资本控制的影响，并且超出资本控制宏观经济效应的传统分析范围，研究了资本控制对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影响情况。这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以前都忽视的内容。

这一分析为福布斯赢得了在政策导向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良好声誉。然而，过分专注于政策导向的分析研究并非没有风险，尤其是在被他人误解的情况下。例如，福布斯关于资本控制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发现经常被解释为，由于对中小企业比对大企业的影响更大，政府应该避免对资本流入的控制。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于面临资本流入加剧信贷膨胀的国家，主要政策替代方案应该是审慎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可能对小企业的影响更大，因为小企业总

是比大企业更依赖于银行融资。

类似的还有，福布斯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文也不应该被解释为暗示着不平等有利于增长。因为后续研究显示，其结果取决于样本选择，只根据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进行估计(福布斯所使用的技术)通常只能发现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短期正相关关系。而不平等对增长的负面影响是通过分析变量随时间变化及其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这两个方面来发现的。

骚扰电话？

福布斯职业生涯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官场，她也非常明白应用学术研究成果制定政策的微妙之处。2001年的一天，她在世界银行任职之后的下一个直接参与政策研究的机会来临了。当时，福布斯跑完步回到家，在电话留言机中听到了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的留言，邀请她前往华盛顿特区的财政部见面。一开始，她还以为是有人在开玩笑。当然，她知道泰勒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刚被任命为乔治·W. 布什政府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但是，为什么他要与她谈话呢？她差点就删除了这条留言。

最后，她还是回复了泰勒的电话，知道泰勒是想要她在财政部建立一个新部门，来监控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危机之后世界上的脆弱之处。福布斯还没有决定，因为自从在世界银行工作以来，她已经感受到学术界与政界两方面的吸引力，而且认为这两个圈子之间并没有进行足够的互动。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她的当务之急是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不是游走在华盛顿的权力走廊中。

因此，她两次婉拒了该邀请，直到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前导师鲁迪格·多恩布施(Rudiger Dornbusch, 也是一位在学术界和政界都知名的主要国际经济学家)打电话来劝说为止。多恩布施一直劝说她，直到她同意，“我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想实际地影响政策，影响这个世界，你应该去实现它。”

真实世界的数据

所以，福布斯于2001年重返华盛顿。她说，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可以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将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真实世界，因为在真实世界中，你不能在事件发生九个月之后才告诉大家此事件将会蔓延，实际上你必须提前预告。当然，这的确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比如怎样才能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情况，以及如何将研究成果变得可以应用于实际情况。”在财政部任职时，福布斯也参与了一系列她以前从未想过的项目，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千年挑战账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这是一个通过制定有资格接受援助国家的标准，以让美国

的对外援助变得更有效的项目。

次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后，福布斯开始撰写有关自己在政界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论文（包括金融危机的蔓延），直到电话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是加入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邀请。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福布斯研究了很多国际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包括主要贸易伙伴的可能货币操纵和国际税收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被广泛报道，那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大量资金存放在海外，以避免承担高额的企业税。福布斯再一次运用自己的分析才能，为公众解惑。这些跨国公司都齐声抱怨说，它们不能向美国境内的投资提供资金，因为将这些资金调回国内的成本太高。而其真正的意思是说，它们应享受（至少）一次性免税，来帮助刺激美国的投资。

对于福布斯和其经济委员会的同事来说，这并不真实，但由于缺乏可靠证据，他们无法反驳这一观点。虽然这些公司似乎有令人信服的案例，但都被福布斯的后续研究所否定，因为研究显示，如果这些公司确实将资金调回国内，它们通常将这些资金用于分发红利，而不是投资于有形的工厂或者雇用更多的工人。

开放的心态

学术界和政界之间的互动——研究成果影响决策，政策问题启发研究——已经成为福布斯工作的特征。但是，与很多人不同，她也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根据新的研究和证据改变自己的观点。例如，福布斯早期对于资本控制的研究倾向于强调其成本，而最近关于资本控制对减轻金融风险稳定作用的研究，以及越来越明白金融开放国家的审慎措施和资本控制之间实际区别非常小，都让她认识到资本控制在改善金融系统弹性方面的潜力。

她给年轻研究人员的建议也是同样的风格：挑选既重要，又是你关心的主题；自问为什么要做研究工作；勤学好问；从各个角度考察研究问题；在可靠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因为福布斯现在是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尽管她最近宣布不会寻求该委员会的下一任期，但还是不愿意谈论当前政策问题。不过，她的观点是制定政策应该以坚实的实证证据为基础，与此相一致，她也明显对似乎已成为流行语的那些反专家、反精英、事实无关紧要等态度感到不安。通过自己的研究，福布斯继续努力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解释基本经济事实，希望对他们制定重要决策的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她也敦促学术届花更多的时间与象牙塔之外的民众进行交流：“我们（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确实都需要走出去，与企业交谈，与街头普通人交谈，与民众交谈，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担忧所在，以及所思所想。”

福布斯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已经献给了国际经济学，她的婚礼甚至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的，

就在那个1944年提出IMF和世界银行构想的地方（但她赶忙解释，自己挑中那家宾馆是因为其便利的位置，而不是因为历史联系）。因此，她对当前的反全球化逆流非常担忧就不令人奇怪了。她认为，反全球化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未能用易于理解的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式与普通民众进行沟通。

她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根据新的证据改变自己的观点。

尽管一些反全球化情绪起源于对极端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担忧，但她也认为全球化对不平等的影响不应该被夸大。她特别提到，在英国，虽然最近几年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下降，或者说至少没有加剧，因为低收入者的工资比高收入者增长得更快，但很多人仍然对变革感到难以置信的沮丧和恐惧，最终体现在英国公投退欧上。因此，学术界和政界的经济学家都必须更好地理解 and 更好地解释全球化如何可以让所有人受益。

为儿童进行驱虫治疗

学术研究达到最高水平也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这也是福布斯为什么会参与驱虫项目的原因。该项目是她能够广泛地运用自己才能的一个例证，因为她走过很多不同道路（有时也是意外的），而且也总是成果丰硕。

几年前，福布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同事蕾切尔·葛兰奈斯特（Rachel Glennerster）、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共同发现，确保发展中国家儿童待在学校里是帮助他们摆脱寄生虫的最合算方式之一，而寄生虫经常让这些儿童病得上不了学。这一发现促使他们成立了一家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儿童进行驱虫治疗的慈善组织，而福布斯自愿贡献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知识来帮助成立该慈善组织。

“真令人惊奇，”作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自豪的母亲，她激动地说，“优秀经济研究的力量可以筹集这么多的捐款。只用给这些儿童一年发一片药，他们就可以摆脱寄生虫的困扰，学到更多的知识，让他们不再昏昏欲睡，还可以从食物中吸收更多的矿物质，变得更健康。所以说，这非常容易，非常有效，真令人难以置信。到目前为止，大约已经为2500万到3000万儿童进行了驱虫治疗，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学术研究！”■

阿提世·雷克斯·戈什（Atish Rex Ghosh）是IMF历史学家。